

中国女记者

中国女记者编辑委员会 编

！

中国女记者 1

《中国女记者》编辑委员会 编

•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京安印刷厂印刷

•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.375印张 插页9张 430,000字

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,900册

ISBN 7—5011-0272-4/C·76 定价：5.95元

目 录

序.....	李 普 (1)
卜昭文	我记忆中的两片小叶..... (2)
丁补天	香江岁月..... (16)
计泓庚	新闻,我一辈子醉心的事业..... (25)
王 苗	我的摄影路..... (46)
古 平	一次难忘的采访..... (53)
孙维熙	随笔..... (65)
安仲皇	耕耘与浇灌 (郑华 撰)..... (82)
刘佩珩	我爱这又苦又甜的记者工作..... (96)
刘 娟	我和我的采访对象..... (110)
司马小萌	她,颠簸在生活的波涛中 (顾希波 撰)..... (124)
陈佩明	我学着做一个“冲浪者”..... (135)
邱 健	执著的追求者和献身者 (周丁 撰)..... (150)
芮宛如	在对外宣传第一线上..... (164)
陈娟英	往事的回忆..... (181)
余志恒	风风雨雨四十年..... (187)
迎 秀	简述我的新闻生涯..... (202)
沈 容	第一次访刘帅..... (218)
李亚丹	为文为人总是真 (刘波 撰)..... (233)
沈骥珠	记者·母亲·教师..... (246)
林 宁	新闻工作忆旧..... (260)

梁再冰	转折.....	(275)
罗小韵	黄河漂流摄影日记数则.....	(289)
杨 璞	探索.....	(298)
柏 生	匆匆的脚步不是梦.....	(314)
侯 波	幸福的岁月.....	(330)
钟 秀	别了, 外科女医生.....	(338)
张慧贤	探索中的体会.....	(351)
欧阳采薇	回忆新闻工作中二三事.....	(364)
欧阳惠筠	不做懦弱无能的人.....	(377)
张爱平	一片叫人眷恋的土地 一个令人醉 心的职业.....	(387)
徐佑珠	她属于新闻摄影(陈小波 撰).....	(402)
钱 行	从清凉山到六部口.....	(409)
顾迈南	我的记者生涯.....	(422)
殷金梯	感谢帮我拿起笔来的人们.....	(436)
顾德华	我愿如涓涓细流.....	(451)
黄力谷	新闻生涯中的一些感受.....	(456)
黄 薇	光辉的战斗历程 (吴回渊 撰).....	(466)
戚庆莲	值得怀念的记者生涯.....	(479)
程竟明	热诚的竟明 (宗子度 格来 撰).....	(489)
塔吉古勒	第一代维吾尔族女摄影记者 (晓黎 撰).....	(503)
蔡锡梅	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.....	(509)
樊云芳	记者梦.....	(524)
谢 珏	方寸之内的寻求.....	(542)



简 历

卜昭文，1930年11月生于江苏铜山一个农村小学教师的家庭。1948年底，在“淮海战役”的炮声中以中学生的身份，赴解放区参加革命，被分配到冀鲁豫日报社任见习记者；1952年调新华通讯社当助理记者；1957年被错划成“右派”在分社当资料员。1979年恢复了记者工作后，怀着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，活跃于内蒙古草原，陕北黄土高原，以及山海关外、辽河之滨，写出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。1987年被评为主任记者。

1956年卜昭文曾被推选为北京市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，1983年被推选为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。

我记忆中的两片小叶

卜昭文

岁月催人，弹指间我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已度过了三十七个寒暑，因为1957年的不幸遭遇，其中二十一年虚度了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我才重新回到记者队伍中来。

在那被人冷落的漫长岁月里，我不甘心让年华空逝，如饥似渴地读书、学习、观察、思考，透视社会，认识人生，积蓄力量，为做好一个真正的记者打基础。

长夜以思，童年时代经常背诵的一首歌谣不时在心头涌起：“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；寸金失去有处找，寸阴失去无处寻。”我失去的时间太多了！难道真的无处寻吗？不，我一定要寻它回来。

这是我恢复新华社记者工作时写下的一首诗：“二十年旧愁新愁，重重叠叠压心头；心如冰清玉洁，半生泰然处之；昭昭明月，区区我心，难以表述。坚信伟大的党，定能实事求是。一朝回到党的怀抱，更有千言万语，万语千言，说不尽心无限喜悦。待万事从头起，再把后半生全部献出。”

那时正是拨乱反正的年代，我接触了好些人和事，极左路线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，真是惊心动魄！它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，使我不能不激愤地拿起笔来，为人民群众鸣不平，向那条左

的路线冲击。

那是令人难忘的日子。

1979年初春的一天，我坐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群众来访接待室里。一位约莫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推门进来，两眼直愣愣地望着我，劈头一句话就是：“记者同志，我叫秦萍，有天大的冤情要诉说，请您为我伸张正义！”我仔细打量她，心中不禁一颤，一个面目清秀刚到中年的妇女，怎么满头白发，无一根青丝？马上想到这可能是愁白了的。

她悲痛地诉说着她丈夫被错判死刑的经过，没有流一滴眼泪。原来，她告状告了八年，跑了好多部门，向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一千多封信皮上写着“代击鼓鸣冤”字样的信，但始终无人过问。她的眼泪流尽了。

过了几日，我和刚到分社工作的青年女记者小方一起去寻找她的家进行访问。只知她家住在呼和浩特市一条小巷而不知门牌号码。这条小巷里都是平房，家家户户深锁大门。唯独有一家室门大开，内又无人。我即刻想到，难道这个家庭不怕小偷吗？仔细观察一下，哦！全明白了，这个家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，只有一个破土炕，几条破旧的被子，墙壁被灶火熏得乌黑，屋里空空荡荡。此时，邻院里突然传来几声犬吠，给这个死一样寂静的小院顿增了几分凄凉。

一会儿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来了，一打听，这就是秦萍的家，这个男孩子是她最小的儿子。孩子很懂事，给我们倒了两碗水。女主人不在，我们怅然离去。

这次初访使我的心很不平静，面对这个不幸的家庭我能沉默吗？此后，秦萍成了我家的常客，我们进行过多次交谈。后来我又走访了当时办案的一些司法工作者，终于弄清了这件冤案的始末。

五十年代初期，一对年轻的夫妇，怀着建设祖国边疆的热

情，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江南，来到塞外安家落户。男的名叫叶融，年方二十二岁，南京工学院化工系毕业，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轻化厅科学研究所任技术员。女的还不到二十岁，分配到内蒙古歌剧院当会计。

1957年，叶融忠实地给组织写了思想汇报，谈了对反右派的不同看法，因而被划为右派。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象这样的家庭是在劫难逃的。一天夜里，叶融被造反派拉走了。妻子日盼、夜盼，满以为会被放回来的，谁知，她的丈夫不但没有回来，反而竟被当时的执法机关当作“现行反革命”判处了死刑，死时年仅三十九岁。罪行是“对红卫兵抄斗极为不满，到处上访告状，喊冤叫屈。”

叶融被枪决的那一年，秦萍也只三十六岁，身边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，悲愤、穷困短短几十天里她的头发全白了，就如同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愁白了胡子似的，反应了她所遭受的残酷打击。

叶融一案不是孤立的，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，在“四人帮”横行时，人民中的冤案堆积如山，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。

可“四人帮”倒台已两年了，叶融一案为什么还没有得到平反呢？我所了解的情况告诉我，司法部门的不少同志不是不承认冤案，而是由于种种思想的禁锢，不敢为他平反。政治案件能平吗？“现行反革命”案件能平吗？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能平吗？

“文革”中的案子能平吗？平了这样的案子，自己又被怎样对待？这些问题困扰着他们的头脑，使他们不敢实事求是，坚持唯物主义。正因为如此，有多少人像叶融一样在含冤受屈！我反复思考着，连夜赶写了一篇题为《“左”字的幽灵在司法战线》的报道。

此稿引起最高人民法院的关注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亲自过问此案，最后叶融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了。

后来，内蒙古司法部门又举一反三，陆续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。于是，我又接着写了《内蒙古司法部门解放思想，冲破禁区，大胆为平民百姓平反冤狱》的新闻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作为联播节目的头条新闻播出，《人民日报》以显著地位刊登。事后，数千封读者来信寄到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我的手中，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在信中说，每一个为平民百姓做出好事的人将永远被人民称颂和记忆。

事隔两年之后，我又碰到了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，这件事在我心底引起的震动，甚于“叶融之死”。

1981年11月，全国作协在西安召开《创业史》文学讨论会，我采访的任务是写一条简单的会议消息。会议期间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评论家们到《创业史》的写作基地——西安郊区皇甫村参观访问。这样的活动在会议新闻中原只能写上一句话，记者可以不去。经验告诉我，一次参观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，因此，我决定走一趟。

到了皇甫村口，大家急切的想看到《创业史》中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，想像着他应该有的模样。过了一会，王家斌来了。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，这位朴实憨厚的老农，穿着一身破旧的棉衣，脸色蜡黄，神情凄然。他说他的老伴躺在炕上，病得要死，不能请同志们到家里坐坐，实在对不起。我们一行人只好坐在村旁地头的稻草堆上和他交谈。

王家斌在旧社会要过饭，解放后是土改和互助合作化的积极分子，陕西省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。他的家庭和整个生产队在互助合作化中由穷变富了；“四清”后，特别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，这个队又由富变穷了，他自己几乎到了讨吃要饭的地步；如今，“四人帮”粉碎后已经五年，他的景况依然如故。为了给老伴治病，他把一床八成新的棉被子插个草棍棍，抱到自由市场上去卖了。听着，听着，大家都默默地擦眼泪。此刻，一个鲁迅笔

下润土的形象顿时浮现在我的眼前，而作家柳青《创业史》中的那个英俊潇洒、神采飞扬的青年农民梁生宝和眼前的王家斌还有什么相同之处呢？这难道不是一场悲剧吗！？而这是“大锅饭”带来的结果。

谈了一会，王家斌又领着我们去柳青的墓地凭吊。初冬的田野是萧瑟的，天忽然又阴了起来，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。我们站在孤零零的墓地上，眼看着一代作家柳青生前的农民朋友是这个样子，怎能不百感交集。文学评论家们都眼含热泪要求我把王家斌的处境反映出去。作为新闻记者，我怎能无动于衷呢，说真的，我比他们还激动。

王家斌和他所在的生产队由穷变富又由富变穷的经历，不正是新中国农村三十年经历的缩影吗！《创业史》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，正因为这个地方是这部作品的写作基地，而王家斌又是个历史性人物，我想，如果把这个新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所遭受的厄运，如实地报道出去就可能收到震撼人心的新闻效果。

数日后，我又来到王家斌家里，这次干脆在他家住下。我和他及他的老伴长谈了一天一夜，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，最后采用现场即景的白描手法，写了《大锅饭带来的悲剧》一文。

习仲勋同志看到报道后作了批示。他说，王家斌的情况，很值得深思，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和遭遇，而是一条“左”的路线所造成的恶果。……当时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接到批示后，立即带领调查组到王家斌那里作调查，并派工作组帮助王家斌所在的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。从此，这个离西安近在咫尺的地方又由穷变富了。

中国作协办的刊物《文艺情况》转载了此文，文艺界的同志们看后反映强烈，不少人流了泪。诗人贺敬之来西安时，为此专门找我，要我和他一起去探望王家斌。

一位离休老干部流着眼泪给王家斌写信表示慰问，又寄钱支

援他给老伴看病。并且说，记者同志在这个历史性人物、历史性的社会问题的报道上立了一功，假如柳青同志九泉下得知此事，一定会亲手给这个记者戴花佩红的。

回忆这些往事，常常使我深夜难眠，它激励着我，永不放下记者的笔。从“四人帮”粉碎到现在，我什么也不顾了，可以说夜以继日，马不停蹄地在采访写作。我的工作告诉我，一个记者如果能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，与祖国的脉搏跳动在一起，就会永远年青，永远有写不完的报道。

在短暂的记者生涯中，给我留下一串串难忘的记忆，本文所写的事例，仅仅是我记忆中的一两片小叶子，笔者愿以此奉献给亲爱的读者。

(1987年11月7日于沈阳)

“梁生宝”们在重新创业

卜昭文

离古都长安七十里有个皇甫村。已故著名作家柳青在这里生活了十四年，写出了一部史诗性的作品《创业史》。皇甫村头长眠着这位人民的作家。

如今，这里满目春色，麦苗儿青青，油菜花金黄……

我曾多次到这个美丽的村庄，凭吊柳青的墓地，访问他当年

的农民朋友。这个村庄三十年来的曲折经历使我的心情激荡，久久难以忘怀。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莫过于柳青最亲密的朋友王家斌和他的一家。

王家斌是陕西省五十年代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，现已年过花甲。他是一个勤劳、纯朴、善良的农民，柳青在塑造《创业史》中梁生宝的形象时，主要的依据就是他。

令人泪下的农村景象

1981年11月的一天，我曾随《创业史》文学讨论会的文学评论家们，来到皇甫村访问王家斌。初冬的田野，一片萧瑟，家家户户的门口堆放着一些杂乱的稻草，有人无精打采地躺在稻草堆上。我们一行人在田头上见到了这位朴实的老农民。他面容憔悴，身材瘦高，穿着一身破旧的棉衣，眼睛虽还有神，但却深深地陷了下去，依稀可以想见他的年轻时代就象柳青笔下的梁生宝。谈话间，他时而憨厚地一笑，时而又透露出一种凄凉。回忆往事，他无限感慨地说：“当年柳青同志领导我们搞土改，搞互助合作运动，眼看日子越过越好。哪里想到，如今人老了，落得一身的债，又快到讨吃要饭的地步了。”他的老伴正躺在炕上，病得起不来。他抱歉地说：“不能请同志们到家里坐，实在过意不去……”话虽不多，却使大家感到心情沉重，有的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人们纷纷议论说：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落到这步田地，真是令人惊心动魄。如果柳青九泉有知，也会潸然泪下的。

不久，我单独去访问了王家斌。他家里的光线暗淡。老伴在炕上呻吟着，铺盖又脏又破，屋里空空荡荡，只有初级社时盖的三间大瓦房算是唯一的财产。

我说明了来意，王家斌长吁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多少年了，到我家里来访问的人，都让我谈皇甫村过去的好光景，他们是搜集材料写文章用的，我早就不想再说了。您想了解我现在的日子是怎

样过的？这样问我的人还是第一个。”

“说吧，说吧，不要犹豫了，把心里的话都掏给这位同志！”他的老伴忽然有了精神，从炕上坐起来。这时，我才注意到她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农村妇女，尽管五十多岁了，又是面带病容，但仍掩盖不住她的秀气。

王家斌为我倒了碗茶水，然后对我说：“在旧社会，我从小就跟着父母逃荒要饭，住草棚。现在，我又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了，实在没有办法时，我打算拆房梁卸门板，卖了给老伴看病，我们全家只好再搭个草棚住。”

天黑了，王家斌一定要招待我吃一顿饭。我一再强调不要单独为我做饭，大家都吃一样的。他的老伴不答应，生气地说：“这是我们家的老规矩，搞土改、互助合作那几年，家里来了干部，都是这样招待的。”我没话可说，这份深情厚谊只有默默地领受了。

王家斌的老伴不能亲自做饭，便躺在炕上指挥着女儿，为我炒了盘鸡蛋，砸了蒜末，炸了辣椒油，下了挂面。据说，挂面还是柳青的大女儿新近送给他家的。小外孙看见炒鸡蛋，哭着要吃，王家斌的老伴让女儿把小孩强行抱走。此情此景，我怎能吃得下去！

王家斌为什么会落到这般地步？他明确地回答说，造成他家生活困难的原因，除了有病人外，主要的是他所在的生产队长期吃大锅饭的结果。

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：为什么由富变穷？

王家斌所在的长安县皇甫公社胜利大队第一生产队，位于西安市郊区。清澈的镐河流过村头，这里几乎全是水浇地。一年两季收成，一季是小麦，一季是水稻。论自然条件，可以说是个十年九丰收的富庶之乡。可是，我在这里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，

村中冷冷清清，毫无生气。下午四点钟才打上工铃，农民们慢吞吞地走向集体劳动的场地，干了一个多小时就休息，老汉们在场院旁抽旱烟，年轻人打扑克。休息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还长，凑凑合合再干了一会儿，就收工了。

这个生产队，共有五十多户，四百多亩土地，每人平均约一亩三分地。在旧社会，这里大多是从外地逃荒来的贫雇农，他们给地主扛长活，没有地方住，就在地头上搭个草棚棚，因此又叫草棚户，很不象一个村庄。解放了，王家斌和全村贫雇农都分到了田地。1952年，以王家斌为首，组成了六户贫农的互助组。年轻的王家斌艰苦创业，使得互助组成员初步摆脱了旧社会带给农民的贫困。也就是这一年，柳青带着全家人从北京来到皇甫村安家落户。他一眼就选中了王家斌，把他作为《创业史》中梁生宝的模特儿。作家和王家斌一起生活，一起战斗，一起创业。在柳青的带领下，这个互助组逐步发展成为十七户贫农的初级社。当年的互助组成员回忆起1952年到1955年这段黄金时代，个个眉飞色舞。他们高兴地说：当年的互助组、初级社，每亩土地产稻子一千斤，小麦五百斤。劳动日值一元四角，粮食多得吃不了。那时家家有余粮，户户有存款。居住的草棚变成了大瓦房，在四百多亩土地中间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小村庄，当时群众给这个小新村起名“兴隆坊”。

1964年的“四清”运动使王家斌和他的伙伴们遭了厄运，这位老实农民王家斌被打成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”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又被打成“黑作家柳青的黑柱子”。王家斌下台了，从此兴隆坊便不兴隆了。亩产由一千多斤降到四五百斤，劳动日值由一元四角降到二角多，再加上生产队的干部挥霍浪费和贪污盗窃，几乎家家户户挣的工分不够口粮钱，很多强劳动力一年干三百六十个劳动日，还不够养活自己。群众气愤地说：旧社会我们养活一个保长，现在我们要养活七八个“保长”（指不劳动也拿

工分的队干部)。因此,农民没心思劳动。吃大锅饭的结果,使集体经济遭到了破坏,兴隆坊由富变穷了。

由于在五十年代王家斌长期当队干部,只顾勤勤恳恳地工作,家中很少积蓄。因此,他是全队生活最困难的一户。全家八口人,他和老伴、女儿、女婿以及四个小外孙子、孙女。他的女儿和老伴每年每人可挣两千多个工分,女婿每年有三百六十个劳动日,他自己也能干活。论劳动力不算少,但劳动日值只有两角多钱,分的粮食不够吃。老伴忧虑过度,得了重病,长期卧床不起,王家斌也得了肝炎和心脏病。在十年动乱时期,真是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。为了给老伴治病,亲戚朋友都求了个遍,借来的钱仍然不够用。王家斌狠了狠心,抱起一床八成新的棉被拿到集市去卖。他怕熟人看见,面子不好看,就在棉被上插个草棍棍,远远地站着等买主来买,心里象滚油煎似的难过。

当年和他一起搞互助合作的穷哥们看见了,就把被子一卷,说:“回!回!回!说啥也不能让家斌哥卖被子。”

常言道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,但是,事到如今,任何硬汉子在这种场合,都会失去自制力的。他感动得哭了。穷哥们雪里送炭,马上给他凑了三十元钱,解救了燃眉之急。

新中国农民的典型人物竟落到卖被子的地步,这确是一场悲剧。这场悲剧是“左”的错误所造成的。

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知道了王家斌的情况,立即来到王家斌家里。这时,正是旧历除夕,省委第一书记坐在王家斌家的炕头上,心情也是很平静的。正象笔者见到的景象一样,老伴卧病在床,王家斌的心脏病也复发了。年关临近,家中吃饺子的白面还是政府救济的。看到了这种情景,马文瑞的眼圈儿都红了。他当即决定,春节后向皇甫村派驻工作组,协助这里的农民搞好农业生产责任制。

光景又好了，还有三件大喜事

工作组进村，改选了生产队的领导班子，当年王家斌互助组的好伙伴、“四清下台干部”、敢说敢干的董炳汉（《创业史》中冯有万的原型）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兼胜利一队队长，王家斌当选为大队党支部委员兼顾问。当年的区委书记，现在的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、工作组副组长孟维纲带领他们实行了生产责任制。

无巧不成书，这个孟维纲正是《创业史》中区委书记的生活原型，也是柳青的好朋友。《创业史》人物又汇集到一起了。他们为了消除极左路线给皇甫村人民带来的灾难，日日夜夜地战斗在一起，重新开始谱写新的创业史。头三脚难踢，群众手里空空的，无法搞生产。他们又象“梁生宝”一样，带领群众到终南山砍竹子，扎扫把，搞副业。队长董炳汉又象五十年代搞互助合作时那样，起早贪黑，没明没夜地苦干。他以身作则，请吃不受，送礼不收，集体资金一分不借用。王家斌因为身体不好，只能当董炳汉的顾问，经常给他出主意，想办法。群众说：“创业精神回来了，又把我们领上了正道，富日子有了盼头。”

推行责任制刚刚一年，胜利大队就获得了粮食大丰收。去年全大队粮食总产七十八万二千多斤，亩产九百零七斤，人均产粮超千斤。百余亩麦稻两季平均亩产一千一百九十七斤，创历史最高纪录。尤其是王家斌所在的胜利一队增产幅度更大，总产比1981年翻了一番，人均口粮达到六、七百斤，超过了被群众称为“黄金时代”的1955年，结束了最近六年吃返销粮的穷日子。干部群众齐心协力，再也不愁没粮吃了，家家户户喜气洋洋。请看下面的场景吧！

1982年夏季，骄阳似火，皇甫村里的田野一片丰收景象。我和孟维纲以及柳青的女儿可风一起，再访皇甫村。刚到村头，只见王家斌和董炳汉正在和群众一起在场院里打麦子，这户打完

了，又是另一户。人们忙着过秤，把扬干净的小麦装入麻袋，扛到各自的家中。王家斌见了我们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走，咱们回家吃饭去！”

这回来到他家，与1981年冬天所见到的景况完全不同了。只见房门大开，室内的陈设虽然还很简单，但却是窗明几净，院子里成群的母鸡咯答咯答地叫着，气氛热烈、明亮。他的老伴病也好了，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青布衣裳，笔逐颜开地迎接来访者，好象突然年轻了十岁。刚一坐定，她立刻就为客人端来了一碗白糖水卧荷包鸡蛋，午饭的主食是精白面粉春饼，副食是新鲜豆角炒鸡蛋，还有蒜汁辣子。她开玩笑地说：“上次您来吃炒鸡蛋，小孙子哭着要吃，您没吃好；现在，我家里养了一百多只来亨鸡，每天可以拣一篮子鸡蛋，小孙子吃鸡蛋都吃腻了。这次，他不会‘抢’了，您放开吃吧！”说完，大伙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1983年春节，古城西安万户欢笑。王家斌穿了一身新衣服，拿了几斤他家新产的雪白大米，来到我家。一进门，他就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在1982年遇到的三件大喜事：

第一件，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，苦干一年，就翻了身，全家八口人，人均口粮八百斤（1981年吃大锅饭人均只有二百斤），这是自合作化以来，他家收粮最多的一年，养鸡、养猪副业收入近千元。已经还了几百元的欠款。

第二件，陕西省人民政府落实老劳模政策，重新给王家斌发了“劳模荣誉证书”这是他政治上的大喜事。

第三件，与王家斌共过患难的著名作家柳青的墓地就要重新修建了。王家斌把这件事看成比他自家的更为重要的喜事。过去，每年清明节，王家斌都要来柳青的墓地添土，看着这矮小的墓碑和一小堆黄土，他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觉得这墓地太简陋了。多年来，这件事一直是王家斌的一块心病。如今，这块心病就要去掉了。

谈完三件喜事，王家斌感情激动，一连喝了三杯酒，脸上红